

抗日战争中，拔掉日寇在我国国土上最后一个据点——

高邮战役

■倪敏芝



记史

走进高邮城区熙和巷70号“侵华日军向新四军投降处旧址”，映入眼帘的是“抗日战争最后一役胜利广场”12个大字。80年前的12月19日至26日，在这个有着20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发生了一场我军对日伪军进行的最后一次战役——高邮战役。

高邮战役，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4个多月后，新四军经过激烈战斗歼灭日伪军，收复被占地区的收官之战。它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后一役彪炳史册，成为抗战史上的一座丰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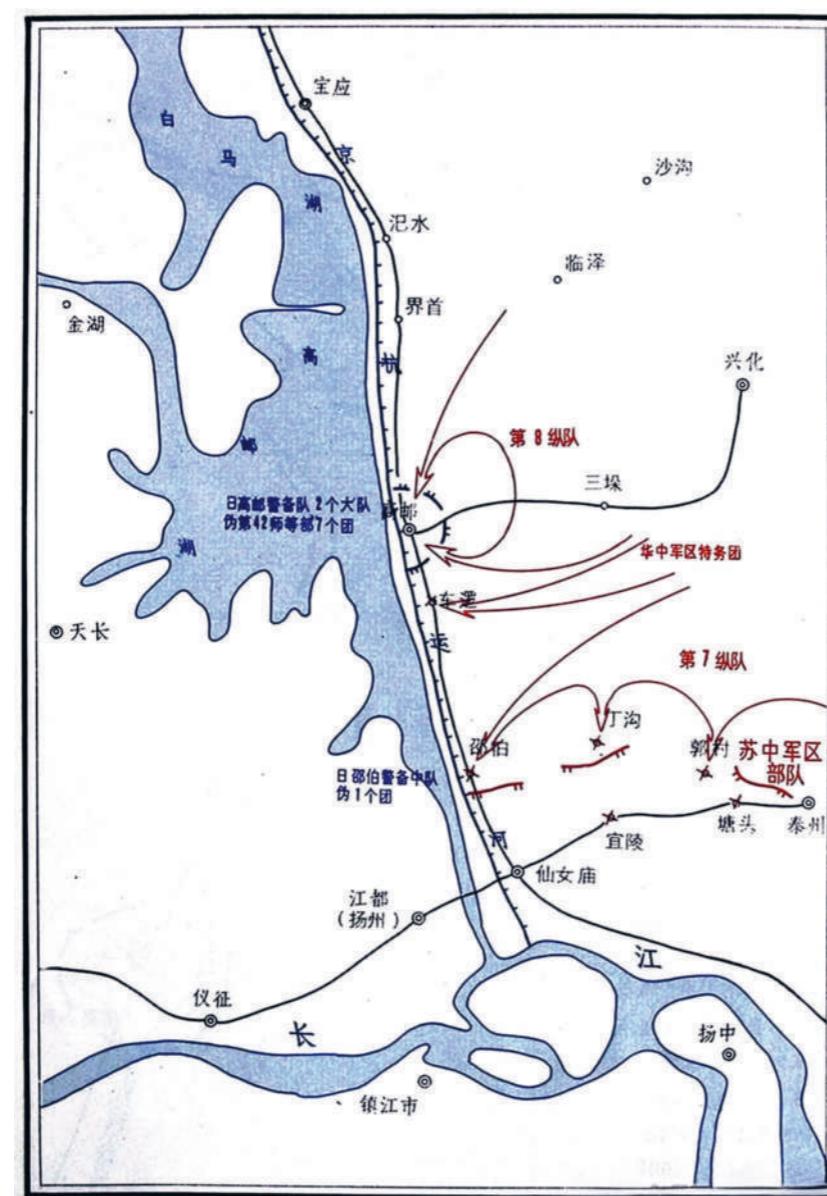
败军投降、胜利之师受降，本是战争法则与历史公理。然而，当时的情况远非如此简单。

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前途命运的大局出发，从中华民族大义出发，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局出发，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提议国民党政府划定受降区。

1945年8月，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目前紧急要求》，就抗日战争胜利后保证国内和平问题，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十四项要求。其中一项就是明确国民党方面：“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为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同月，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为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

然而，我党的这些正当要求均遭到国民党方面拒绝。国民党政府一方面严令日伪军不得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还调兵遣将，袭扰我解放区；另一方面与日伪军暗中勾结，进一步压制和阻扰我党抗日武装。同时，有些地方的日伪军有了国民党方面的支持，更加有恃无恐，继续加筑城防工事。盘踞在高邮的日伪军，其声势“有胜于往昔”。他们不仅拒不投降，而且杀害了新四军派去高邮劝降的人员，决心顽抗到底。

早在日本投降前，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就审时度势，牢牢把握抗战的主动权。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同志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10日，朱德发布命令，限令日伪军缴械投降。1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指出，目前阶段主要注意力应集中于解决敌伪，勇敢、坚决、彻底地争取最大的胜利”。就在日本发表“停战诏书”的前一天，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电令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13日，毛泽东



1945年12月19日至26日，高邮战役要图。

资料图片

明确提出：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强调“我们的军队不去打，敌伪就不缴枪”。

自8月10日起，华中军民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全力向一切拒不投降的日伪军进攻。在华中抗日军民的全面反攻下，一些日伪军被迫投降，分散在交通线上的日军也开始收缩集中。被日军占领6年之久的高邮，因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成了日军据守的最后一座县城。

12月3日，张鼎丞与粟裕、邓子恢、谭震林、曾山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举行高邮战役，歼灭该地拒降之敌。两天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着眼我军战略全局，同意攻打高邮，在战役指导下提出“速战速决”的方针，“整个战役，以一个月内结束才好”。

我军集结宿迁一带待命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央军委决定暂不采取军事行动。粟裕再次建议攻打高邮。他认为，高邮地区位于解放区腹地，城内日军拒不投降，我军攻城歼敌势在必行。建议很快获准。但由于战情不断发展，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电令取消攻打计划，执行津浦路作战任

务。而此时，国民党制定了“半年‘剿共’计划”，确定了“先安关内，再图关外”的战略步骤，扬言“两个月内消灭苏北共军”，随后在华东地区集结重兵，其中在江北沿线摆开了5个军的兵力。

12月15日，占据扬州的国民党第25军有意北上，而国民党第49军也有从江阴渡江北进之势，企图楔入并分割我根据地。粟裕当即起草电报，致电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对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的战略态势及战情形势的走向进行利弊分析，认为高邮、邵伯之战，势在必打，迟早要打，迟打不如早打，若失战机，后患无穷。最后，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同意第7纵队、第8纵队和苏中军区部队攻打邵伯和高邮，第6纵队留在淮海地区，待机协同山东野战军开展津浦线作战任务。

二

按计划，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

一阶段，收复邵伯、肃清高邮外围之敌，并围困高邮；第二阶段，总攻高邮，并全歼守敌。

12月19日，我军发起高邮战役。在以高邮为中心的南北40公里、东西20公里的战场上，向日伪军展开进攻。

盘踞在邵伯的日伪军大部分龟缩在据点内，以邵伯周围陆路和水路的岗哨炮楼为依托，作困兽之斗。在我军的猛烈炮火攻击下，敌人死伤众多，剩下的日伪军沿运河向仙女庙方向仓皇逃窜。待日伪军进入开阔地带，我军立即聚而歼之。

与此同时，高邮周围的拔点战斗激战正酣。战斗打响后，第8纵队司令员陶勇指挥第8纵队向高邮外围之敌展开猛烈攻击，逐点清除，各个击破。

20日午时，清扫外围战场的拔点任务顺利结束。我军攻克邵伯等地，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切断高邮日伪军的南逃退路，保障了我军对高邮的进攻作战。我军把高邮城团团围住，形成关门打狗、瓮中捉鳖之势。

高邮位于江苏省中部，南临扬州，北靠两淮，西濒大运河，是运河沿线上的一个重镇，也是苏中连接苏北的水陆交通要道，素称“运河大门的铁锁”。当时，城内驻有日军1000余人、伪军数千人。1939年，日军侵占高邮后，一直派重兵把守。日本宣布投降后，守城日军还强征劳工，筑堡挖沟，构筑新的城垣和卫星据点，让高邮城更加易守难攻。

20日晚，粟裕率领指挥所人员，星夜从邵伯赶到位于高邮东北郊的司令部，听取第8纵队攻城准备的汇报。22日，他又同陶勇视察高邮城外地形，对下一步作战行动作了详细部署。

25日，我军对高邮发起总攻。攻城的将士们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了高邮城东、南、北三个门楼上的大碉堡和城头工事，敌人视为“固若金汤”的城防瞬间土崩瓦解。

至26日，日伪军见败局已定，纷纷缴械投降。我军官兵爬上房顶，插上象征胜利的鲜红旗帜。

随后，第8纵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代表我军在日军司令部礼堂举行了驻高邮日军受降仪式。韩念龙命令日军立即解除武装，无条件投降。在仪式上，他还宣布了我军优待俘虏条例。

三

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在战役还没有结束时，就写了一篇《论高邮战役的伟大意义》。文中写道：“新四军是抗战的坚持者和胜利者，只要日本一兵一卒如还胆敢不放下武器，那么我们就坚决消灭之。”张鼎丞、粟裕、刘先胜、钟期光在给攻城部队的嘉勉信中写道：“高邮战役的胜利是给予拒绝投降的日伪军最有力的教训。”此役，我军共歼日军1200余人、伪军8000余人，缴获各种炮80余门、枪6000余支，拔掉了日寇在我国国土上的最后一个据点。

战例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中的大渡河战斗并未以声名赫赫的飞夺泸定桥结束。鲜为人知的飞越岭战斗，才是红军突破大渡河天险、打通北上通道的收官之战。飞越岭又称大垭口，坐落于泸定县东南，岭上垭口名为飞越关，南北两侧矗立着海拔超3000米的山峰，双峰对峙形成天然隘口。这里自古便是内地通往康藏的咽喉要道与军事险隘，更是中央红军北上、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关键通道。

■罗璇

飞越岭战斗

打通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通道

这场战斗的源起还要从飞夺泸定桥讲起。1935年5月25日，红1军团第1师第1团于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后，在敌军视作固若金汤的大渡河防线撕开了一道口子。我军多船少，大渡河水急浪猛。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于26日赶到安顺场，在仔细了解情况后，审时度势，果断决定兵分两路沿大渡河赶往泸定桥：红1师和干部团组成右纵队，沿大渡河东岸前进；红1军团军团部、红2师主力及红5军团为左纵队，沿大渡河西岸前进。两个纵队沿大渡河两岸快速行进，袭击泸定桥。这一情报被国民党军获悉。他们紧急重新部署了“围剿”计划：川军第24军第4旅火速向泸定方向增援，以第38团先行抢占泸定桥。

在大渡河东岸的红1师与敌第4旅在龙八铺遭遇。曾参加飞夺泸定桥战斗的王东保日后回忆说：“夺取泸定桥没有1师是不行的，两路夹击，敌人被迫窜逃。”在龙八铺，红1师官兵顽强战斗，最终击溃敌军。这期间，敌第38团团长李金山与第4旅旅长袁国瑞之间一通戏剧性的通话被记录下来，成为还原我军两岸夹击敌军的重要史料。

当时，李金山召集大家商议对策，并通过电话向袁国瑞请示，同时说明泸定桥很难防守。彼时敌第4旅旅部正遭红1师猛攻，局势混乱，仅仓促回复：“我们这里也很紧张”，通话最后还传来枪炮声与“快点！快点！”的惊呼，电话遂中断。这通袁国瑞自顾不暇的电话，加之我军在对岸正在猛攻，大大动摇了泸定桥守敌的军心。李金山率部匆忙放火烧桥，眼见不敌，随后窜逃。

红1师占领龙八铺后，随即东进，追击向化林坪、飞越岭方向逃窜的敌第4旅残部。5月30日，红1师占领盐水溪。袁国瑞率第4旅旅部及第11团残部仓皇退至化林坪、飞越岭。他令第11团残部在飞越岭东麓的三交坪进行整顿，自己则率旅部继续往汉源方向逃跑。

比战，我军俘敌2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杨成武在回忆录《忆长征》中记述，当年站在飞越岭垭口望着烈士遗体，悲痛不已：“你们虽然长眠在山垭口的峰峦，却不愧是英雄好汉，不愧是我军优秀的指战员！”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如今的飞越岭上，每年都会绽放殷红的报春花。在当地人看来，这种花不仅报春，还传递着红色基因。

红军的英勇事迹和牺牲精神，如同漫山遍野的“红军花”，永远绽放在这片他们用鲜血浇灌的土地上。



飞越岭战斗遗址。

资料图片

军史撷珍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歌曲，以其通俗易懂的歌词和铿锵有力的曲调，伴随无数革命先辈南征北战，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根据地军民面临着日军的摧残和物资匮乏的困境，全国各地群众节衣缩食，支援前线，每一粒粮食、每一分钱都凝聚着人民的血汗，绝不允许被侵占。严明的纪律，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更显现出其独特意义。

抗战时期，我党将纪律建设设置于关乎革命成败的高度。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并提出了“四个服从”。这一时期，《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决定》等一系列有关纪律的文件相继出台，党的七大更将纪律写入党章总纲，将纪律建设推向新的阶段。陈云同志曾强调：“纪律是我们的重要武器。维护党的统一，不靠刀枪，要靠纪律。”这种对纪律制度化、规范化的探索，为军队纪律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靠纪律赢得人民

■刘威

财经纪律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经受着严峻考验。1941年，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生活异常艰苦，负责财务的董必武对伙食开支管理极为严格。一次月底结账，有六角钱开支无法说清，董必武坚持在大会上作深刻检讨，并向中央写信报告。这看似细微的举措，在物资奇缺的战争环境下，守护了军队的清廉本色。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群众纪律，铸就了军民之间的血肉深情。1942年，晋察冀根据地旱灾严重，聂荣臻签发“树叶训令”，命令部队不得在村庄15里内采摘树叶，宁可饿肚子也不与民争食。百姓看到训令后感动不已，纷纷请求收回，但战士们严守“红线”，用实际行动证明“群众利益高于一切”。

维护纪律需要刀刃向内的勇气。

人心。1943年，八路军留守兵团颁布《拥政爱民公约》，从制度层面巩固军民鱼水情。

这些纪律建设的丰硕成果，最终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1944年，新四军第4师骑兵连追击伪军夺回群众财物后，彭雪枫下令“分毫不得截留”，将物资全数归还。粟裕在回忆录中总结道：“我们不是靠武器打败敌人，是靠纪律赢得人民。”历史证明，这种融入血脉的纪律意识，使人民军队在极端困难中仍能扎根于人民的沃土之中。

靠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人民军队赢得了人民群众竭尽所能的拥护与支持。历史雄辩地证明：加强纪律性，革命无往胜。这份用生命和热血恪守的纪律意识，已熔铸为人民军队永不褪色的精神底色。

军史发现

长征

第6629期